

考证法在翻译实践研究中的运用 ——以《东瞧西望》专栏为例

李瑞雪 卢敏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在翻译实践研究中, 考证法是经常被用到的方法之一, 但鲜有研究者像陆建非那样在系列文章中以多种具体考证法对翻译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陆建非在《东瞧西望》专栏中, 立足于中英文化, 多角度考证典型词语译法, 切实将考证法应用于翻译实践。本文基于考证法研究, 品鉴《东瞧西望》专栏的精彩案例, 试探外部考证法和内部考证法、二重证据法、溯源考证法、比较考证法、存疑法在翻译实践研究中得以具体运用的可行性, 使翻译者感知其实践意义, 体察双语及双文化, 拓宽知识域, 提升翻译实践能力。

关键词: 考证法; 翻译实践; 《东瞧西望》

An Application of Textual Criticism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the Column *An Encount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Li Ruixue Lu Mi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extual criticism is one of the methods often used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but few scholars are like Lu Jianfei who writes a series of articles to discuss translation problems by applying textual criticism scholarship. Based on Chinese and English cultures, Lu Jianfei truly applies textual criticism scholarship to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his column *An Encount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Combining the study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appreciation of typical examples in Lu's colum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methods used by Lu Jianfei. They are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textual investigation, dual attestation, source tracing, comparison and leaving questions open. These methods are applicabl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help translators to perceive meanings in practical use, observe the two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roaden the scope of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 translation ability.

Key words: textual criticism method; translation practice; *An Encount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一、引言

英语语言文学资深教授陆建非以其敏锐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在自媒体平台开辟个人专栏《东瞧西望》,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媒体新词语在国内外媒体上的英语翻译。陆建非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英语语法、跨文化交际学、都市文化、“非遗”保护与传承、高等教育、移民教育等。其独著和主编的著述、辞书、教材、研究报告等有 20 余部,发表论文 80 余篇,随笔、散文、评论等 350 余篇(陆建非,2020:48)。《东瞧西望》专栏是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公众平台个人专栏,自 2018 年 3 月创办,迄今已发表 37 篇原创网文,在英语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东瞧西望》专栏文章多为随笔形式,部分文章已发表于《咬文嚼字》《英语世界》《社会科学报》等,主要内容涉及中英语言翻译和文化。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增进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了解,传播中国声音,《东瞧西望》栏目中的文章不仅反复锤炼中外传统文化中出现的典型词语译法,而且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大部分文章聚焦中国媒体出现的新名词英译,梳理国内外英语媒体对这些新词语的反应,并做出评价和讨论,体现了有据有证,据证合一的考证学核心,与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1948:1)的学术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英翻译人才培养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考证法研究现状

在我国,考证法萌芽于春秋,汉代司马迁《史记》等整理了大量文献,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有所发展,宋明期间盛行,明陈第曾运用本证法和旁证法考证古音,成熟于清代,包括书证、物证、人证等,与唯物史观相通(祁龙威,2002:70-78)。考证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称考据,与朴学和训诂学相关,通常用于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是鉴识史料、探究实际疑问的一种学术传统和方式。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或“学问”研究时,就称为考据学或考证学。历史地看,考证学可分为传统考据学与现代考证学。20 世纪,考证学由传统考据学演变为现代考证学,于二三十年代蓬勃发展,此期开展了整理国故运动和西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由于西方观念的东传和中国先进之士的努力,现代考证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产生了。如王国维探究“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总结出三互证法并创造诗史互证法,胡适总结杜威的“实证论”,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法,顾颉刚始创层累式考证法,傅斯年提出史料比较法,等等。再者,这些深刻总结出来的方法反过来也推动了现代考证学的发展。80 年代以后,有人总结了“四重证据法”“时空四维考辨法”等(金宏宇,2018:156-158)。1960—1970 年,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打通古与今、中与西等各种各样的疆域界限,考证研究了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



西方自古以来的科学、哲学、史学、校勘学等对考证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公元前 2 世纪的波里比阿、公元前 5 世纪的修昔底德、公元前 6 世纪的赫卡泰厄斯、16 世纪的圭恰尔迪尼（乔治忠，2011：27）、17 世纪的马比昂、18 世纪的斯密特、19 世纪的尼布尔等都对此有一定影响（刘颖，1998：6）。其中西方实证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和兰克史学对中国乾嘉的考证学改进作用明显，学界通常将其认为是中国实证史学的西方思想源头。这三者又与中国的“实证史学”有明显差别。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孔德认为，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为指导，例如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比较法等，才能成为科学（Comte，2009：95-110）。斯宾塞把科学方法分为三类，并引入社会学研究（Spencer，1899：22-42），再加上达尔文进化论等都发扬了孔德的实证哲学，促进了西方实证史学的产生并经日本间接东传。此处的“实证主义”译为 positivism，强调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统筹历史发展状况，将各类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拒斥形而上学，轻视理论。巴克尔真正将源于英美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应用于此。兰克史学于 19 世纪末东传，其产生与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有关。兰克（Lepold Von Ranke）强调“如实直书”“消灭自我”“客观治史”和“科学史学”，以考证史料和“感通”历史过程为重（王娟，2018：185-197+222）。

考证法在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运用由来已久，体现了翻译遵循的首要标准——忠实。玄奘借孔子的话，曾言道：翻译必需音不讹、语不谬，才能义不失、理不乖（陈福康，2005：31）。20 世纪 70 年代，实证翻译研究涌现，从实质上讲，翻译已成为实证学科（Holmes，1987 [1972]：15）。翻译史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才能进一步呈现出翻译史上被轻视、被掩盖的关键事实（方梦之，庄智象，1961：1）。要使译文少出错误，就要做一些细致的考证工作（姚以恩，1985：19）。在考证《诗经》等文献翻译中，译者的阅读活动也需要得到充分重视（潘志明，1998：3）。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前提下，通过考证，将“Shakespeare”译成“莎翁”最为合适（黄龙，1999：3-5）。“翻译勿忘考证”，考证对译作质量至关重要，美国作家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中译本就因缺乏考证而出现误译（奚兆炎，1999：69）。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中对英语外来词的借用屡见不鲜，译者需站在文化角度，对译法和历史背景进行考证。在进行文化传播翻译时，需运用“文化考证法”，以史料和现实开展基本、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且，译者只有脚踏实地，对译文加以认真、深刻的文化考证，才能将其译成另一种语言（史汉生，2007：237）。此外，众多学者还对《圣经》《诗经》《黄帝内经》《围城》《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等中外经典文献、马克思主义著作等译文进行了深入的语义考证研究。



三、《东瞧西望》对考证法的具体运用

考证性研究虽然也涉及对某一事物的详细探究,但拓宽知识的广度与挖掘思想的深度同样举足轻重。就此而言,运用考证法来研究翻译实践需要见多识广,融会贯通。陆建非在《东瞧西望》专栏中探究了众多中英词语翻译的精彩案例,广泛涉猎当下时政、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追根溯源,趣味十足。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考证了相关词语的译法。以往学者们曾有为解决具体问题总结出针对性的考证方法。通过对《东瞧西望》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其运用的考证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 外部考证法与内部考证法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在《史学通论》中谈及史料批评时,定义过“外证”和“内证”(浮田和民,1903:93),即外部考证法和内部考证法。外部考证法是通过对本版的鉴别与校勘,将文本和其他学者的观点相对照,来判定文本真伪与时空维度。内部考证法是根据文本记载者的动机和心理进行研究,以增强文本的真实性。在《东瞧西望》专栏中,陆建非多次将外部考证法和内部考证法应用于翻译实践研究,知人论世并且征实考信。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在强调构建“命运共同体”,陆建非首先运用外部考证法,对译界和相关部门对“命运共同体”的译法进行鉴别与校勘,通过检索外交部网、《中国日报》、新华网、中国网、人民网、《北京周报》等数据库,查询词典,他发现翻译重点在于把握“命运”这个核心词,较多译为“destiny”“fate”“future”。英语国家多以“shared future”来表达积极含义。如,2005年,北爱尔兰提出“A Shared Future”的战略,旨在消除社会分歧、种族隔离、宗派主义等现象,维护社会和谐和文化多元。接着,陆建非运用内部考证法,挖掘“命运共同体”的中文内涵,即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趋向及结果的共享性和永续性,探索世界接纳的观点,包含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等,并结合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发现“命运”在此并非指天命运数,而是用来比喻美好的“未来”(陆建非,2019),内在含义应体现人类命运发展的超越性。由此可见,“命运共同体”译为“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经得起“外部表达”和“内部认知”的考证,最符合表达习惯和民众愿景,成为中国外交的亮丽名片。

2020年的“五四”青年节,哔哩哔哩视频网站推出的《后浪》演讲视频令人感慨万千。陆建非首先对“后浪”一词进行外部考证,发现在《青琐高议》《增广贤文·上集》和《孙女考爷爷》中有提及。并且多数媒体网站将“后浪”直译为“rear waves”“next waves”“after waves”“the waves behind”“new waves”等,对比发现各版本译法无法体现“长江后浪推前浪”以及突出当今青年所处的时代。但通过内部考证发现,此



处更想彰显的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奋起拼搏和永不言弃的精神，“rising”一词更有力量。例如，“rising action”表上升的动作，“rising star”表后起之秀，“rising tide”表上涨的潮汐，“rising prices”表上升的物价，而“rear”“next”“after”“behind”“new”没有体现动态美。由此总结到，“rising waves”在避免产生贬低“前浪”等歧义的同时，也对新一代年轻人满怀信心，更能体现动态哲学思维。陆建非通过“外部校勘”和“内部理解”的考证相结合，提出的“rising waves”译法表达出对“前浪”和“后浪”携手构建更美好明天的殷切期望。

陆建非在《东瞧西望》中对“命运共同体”“后浪”等热点词语的译法分别在“外部”和“内部”进行了透彻考证，这启示我们，在翻译研究过程中，要从多个角度着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仅是羁押于单一的文本。通过外部考证法，翻译者能够考察社会现状和各版本译法，并对比不同语境下的译法；通过内部考证法，翻译者能够进行动机感知，有时还需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在消除歧视和歧义的同时，彰显人文意识和敬意。对于意义复杂深刻的词汇要表达适当的情绪，更要体现国家精神和民众愿景。如此考证，译文会令我们醍醐灌顶。

2. 二重证据法

进入 20 世纪，王国维采用“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结合，即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历史并考证文献。郭沫若将此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笔者认为，此方法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可概括为书上记载与新出现的事物相释意来考证译法。1925 年，王国维提到“古来学问起，大都源于新发见”（王国维，1997：207）。在翻译实践中，陆建非既汲取了前人总结的精华，也结合最新境况考证词语译法，不禁令人“涨姿势”。

丝绸之路作为重大国际化战略构想，“一带一路”的英译重要性凸显，陆建非（2019）认为大部分媒体翻译以异化为主，即在翻译中保留源文语言和文化的特色，如“New Silk Road Initiative”（新丝绸之路倡议），“silk road”译法形象且为英语国家所熟知，且丝绸之路古往今来就是东西方交流的关键通道，有积极向上的国际形象，官方规范译法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强调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对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有利，此为“一重证据”。根据具体语境，也可将其译为“Modern Silk Road”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一带一路”是为了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扩展了之前的东盟理念。“带”译为“Belt”的时候，经济关联（而非用来拴紧裤子的皮带）才得以显现。此为“二重证据”。“一重证据”结合“丝绸之路”包含的语言文化特色和交流意义，体现已有译法的可行性；“二重证据”将原有译法结合时代新意，体现联通性，进行重译以符合当今发展理念，展现这一国际战略构想的精妙和精髓。“二重证据法”的运用给出了“一带一路”不同译法的有力说明。

对于目前将流行词“直播（带货）”译为“live streaming commerce”的译法，陆



建非通过查阅专业术语网站后提到,“streaming”是名词,意为“数据的流播”,即“串流”,是指压缩一系列的影像数据后,通过网络分段传递数据,通过网络上即时传输视频和音频以供可视化的一种技术与过程。比如“streaming video”,指的就是流式视频、串流视讯、视频流或流媒体。“live”意为“现场的,直播的”,“live streaming”就是“直播”的意思。再者与电子商务(ecommerce)相结合得此译法,此为“一重证据”。再者,借鉴美国的视频直播网站WOWZA、digital commerce 360.com和中国国际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和“电商扶贫”的现状,此译法符合当前直播现状和趋势,此为“二重证据”。因其与网红带货相关,也可译为“influencer marketing”。“一重证据”对“live streaming commerce”的字面意思及中文含义进行深究,表明此译法符合科学涵义和大众认知。“二重证据”结合中外媒体报道和直播现状,深入考证词语涵义和翻译现状,表明此译法具有社会影响力,更加有利于电子零售商直播事业挺进全球。陆建非运用“二重证据法”将中国新兴产业中的“直播(带货)”一词的翻译考证得恰到好处。

陆建非(2020)辩证指出,“黑科技”并非是黑色的,“black technology”的译法欠妥失范。首先,根据《韦氏词典》《新英汉词典》的释义,“black”常用于贬义,形容险恶、狠毒、被谴责以及邪恶的东西,如,“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耶稣受难日)、“black market”(黑市,做黑市交易,非法交易市场)等,此译法易让人想到服务于邪恶势力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易误认为是政府秘密进行的研发工作。此为“一重证据”。再者,当下此词主要指高科技演变的先进技术等,而非词的字面意思,此为“二重证据”。陆建非认为“黑科技”可译成“futuristic tech”“cooltech”或借助美剧《危机边缘》(*Fringe*)的剧名创译为“fringe science”。“一重证据”结合英语文化和单词褒贬意,将“black technology”的原有译法进行有力否定,“二重证据”结合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创译“fringe science”来体现如今“黑科技”所彰显的独特先进技术体验。笔者认为,此虽不是官方译法,但有一定借鉴意义。

陆建非在考证“丝绸之路”“直播(带货)”“黑科技”等词语译法时试图寻找“二重证据”,甚至“多重证据”,因为在翻译研究过程中,只讲究“一重证据”往往不足以使人信服,作为译者,也不应只满足于一种固定的传统译法。翻译一个词语,应深入挖掘多种证据,尝试应用“二重证据法”来考证译文。时代在前进,新意也在不断涌现,词语深厚涵义层层凸显,翻译更需巧妙且传神。译者应保持好奇心态,从多个方面挖掘多重证据来使词语译法更精确、巧妙、更有说服力。

3. 溯源考证法

史学家陈垣在文献学、目录学、校勘学研究等方面以史源为重,尤其是在元史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冯利(1986: 26-33)认为,人类学家可以通过语言追溯历史,



语义学家也可以通过历史来研究语义。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也可通过溯源考证来查究译法。陆建非在《东瞧西望》专栏中探讨的时政类词语翻译居多,认为政治是流行词的“锻造炉”,且多涉及古汉语及历史的考证。

关于中美贸易争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认为,“it takes two to Tango”(一个巴掌拍不响),寓意深厚。陆建非(2020)追根溯源,考证发现Tango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Tango”源于南美洲,是指一种复杂的舞蹈形式。20世纪,“探戈哲学家”恩里克·迪谢波洛将探戈视为悲伤之舞,认为:“Tango is a sad thought that is danced”。“It takes two to tango”源自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首歌,歌名为“Takes Two to Tango”,即《两人来跳探戈舞》,歌词强调,两个人才跳得了探戈。对于中美贸易争端,中美两国共同进行和谐谈判并采取合理行动才能解决问题,促进合作。而俗语“一个巴掌拍不响”源自《红楼梦》第五十八回,袭人评价芳官的干娘偏心亲女儿时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恶些。”若直译为“One palm cannot clap”等,不易为外国人理解。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用“Tango”一词暗喻美苏关系。根据历史渊源和情节,陆建非认为用这一俗语来展现中国与美国之间既相互竞争获得提升,又相互协作实现共赢的复杂微妙的关系,非常适宜。驻美大使崔天凯运用此词向外媒巧妙表达了对中美贸易争端的看法,也必定掌握了解此词译法的起源和内涵。在日常生活中,若对词语译法不经过溯源考证,译者和读者便难以感知到其深意并加以灵活运用。

如今,人们逢事都更加讲究找到“铁证”“实锤”,“hard evidence”和“real hammer”的英译版本不少见。陆建非(2019)认为最近国内外媒体时常使用的“smoking gun”更加切合西方人的理解习惯,便对其翻译起源进行探究与考证。陆建非发现此词源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首次出现在1893年发表的《荣苏号》(*The Gloria Scott*)篇中。在监狱船上,假牧师手持还在冒烟的枪就是他谋杀的确凿证据。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对此词语加以普及。在《美国对叙利亚动武面临举证考验》和《谷歌真正的丑闻在中国》中都有提及。2019年1月,《纽约时报》提及“华为威胁论”是否有“实锤”的疑问,此处的“smoking gun”就是“实锤”之意,之后在《华盛顿邮报》《中国日报》等媒体中均有相关表述。笔者认为,此意译的方法如不加以追根溯源的深入考证,译者和读者便难以对词语译法彻底明晰,也就难以明确词语译法的寓意表征和来龙去脉。此溯源考证的过程也是趣味十足的,正如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针对美国政府发表言论时提到“*There is no gun, no smoke*”,汉译为“无证无据”,由此可以看出,宋柳平对原词语内化加以变动,母语为英语的人闻此说法必能马上理解。作为法务官,宋柳平肯定也是在透彻考证、了解这一说法起源和深意的基础上加以表达,此双关语寓意深厚。溯源考证法对网络流行词汇和政治语言的运用和翻译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中外文化都饱含伟大的智慧,如“it takes two to Tango”“smoking gun”等中英文翻译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作为译者,也不能仅仅讲究表面功夫,面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词句重点和难点,都需要饱含“赤子心”,尝试对其起源和发展历程进行溯源考证,增强历史意识,在探究其来龙去脉的同时,提升自身的中英文化素养,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翻译研究也能更加精确和深入。

4. 比较考证法

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和郭沫若、胡适等都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比较。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坚持“证而不疏”,并认为“史学即史料学”,中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应互相结合。郭沫若十分注重将世界各民族的史料进行对比研究,提供可靠史据。在翻译实践中,对具有中英文化差异的词语,陆建非进行了严谨的比较考证,优劣一目了然。

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不同语境下的词语译法以及同一语境下的不同译法都需要进行比较考证。党的十八大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十九大指出,“打铁必须自身硬”,陆建非对多种译法进行比较考证,发现英国《每日电讯报》译法是“To forge iron, you need a strong hammer”,强调铁锤的硬度。美国 CNN 以及《纽约时报》的翻译是“To forge iron, one must be strong”,侧重人的力量。翻译重点都不够到位。而“To be turned into iron, 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strong”,或者“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hard to be turned into iron”等译法中喻体有些错位。“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we must first of all conduct ourselves honorably”的译法味同嚼蜡。而此句中国俗语用在特定情况下的主旨是侧重对“自身硬”的“需求”,这是一种欲望,所以这种“硬”就要求没有最“硬”,只有更“硬”,中国官方译本“It takes a good blacksmith to make good steel”最为到位,“blacksmith”的“铁匠”之意凸出了主体。“It takes ... to do...”句型更能表现出这种“需求”欲望(陆建非,2018-11-29)。陆建非通过对此词在翻译视角、语序、文采上的比较,并结合核心蕴意,考证出最佳译法,强调“铁匠的手艺”,体现出自我革命精神的重要性。

在国家反腐现状下,“打虎”“拍蝇”和“猎狐”的英译要让西方人所真正理解并不是一件易事。陆建非(2018)鉴于此,对照不同译法进行了分析比较,以求得到可靠考证。2015年,官方对两会提及的此词英译为 net “tigers” and “flies”,“用网捕捉”不能将“拍”和“猎”含义准确概括。2017年,对习近平新年贺词提及的此词英译为 cracked down on both “tigers” and “flies”,此强调“镇压、打压”之意,与后面的动物不相匹配。十九大报告中的译文为 take out (擒拿) tigers (老虎); swat (用力打) flies (苍蝇); hunt down (穷追猛打) foxes (狐狸),将三个不同的动词或动词词组施动于不同的象征动物,寓庄于谐。陆建非通过对2015年两会、2017年习近平新年贺词和



十九大报告中“打虎”“拍蝇”和“猎狐”的译文比较考证，认为十九大报告中的译法更合理、更巧妙。在中英动物文化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对中国语境下的词语以西方人更易理解的方式准确且巧妙地对比译出，更利于世界读懂“中国声音”。

作为译员，没有过硬的双语能力，难以胜任翻译实践。如“打铁还需自身硬”“打虎”“拍蝇”和“猎狐”等词语在出现不同表述中时，译法需比较考证一番，才能明辨优缺点，明确其本质。再者，在西方翻译学中，意义比形式优先（Kwok, 2020: 2）。相对于对译文形式，更重要的是对其意义的比较考证。中外对鼠文化、左右文化、距离文化、春节文化、动物文化、饮食文化等意义的理解不同，翻译此类词语时就需要运用比较考证法。

5. 存疑法

因为史料时常存在“不具或不确”问题，钱穆持怀疑态度涉猎并校勘国学典籍。孔子曾言，“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法。赫胥黎崇尚“存疑主义”，只信任充分证据。顾颉刚“疑古辨伪”。“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是史学家陈垣先生的治学体悟。在《东瞧西望》专栏中，陆建非对于几处词语译法也持有疑问，引发了新一轮的思辨。

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脱贫”一词，英国广播公司将“脱”译为“end”“reduce”或“cut”，也有媒体译为“alleviate”，英国《卫报》译为“curb”或者“eradicate”，我国官方媒体采取“lift... out of poverty”的译法，表面含有“把……从贫困中抬出来”之意。但注重个人作用的西方社会认为其含有“被动”语义，无法反映贫困人口在脱贫中的主观能动性（陆建非，2019-04-18），这与强调整体合力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中美智慧和制度存在明显差异，译者和读者对此词理解的思维方式不同，翻译和理解“脱贫”一时的侧重也不同，官方标准译法仍未确定，最恰当的译法仍需考量，“存疑法”的运用推动着对“脱贫”一词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对于胡锦涛在2008年讲话中提到的“不折腾”，陆建非（2018）对其译法存有疑问，认为如何将“折腾”的“杂乱无章”“自我损耗”“徒劳无益”等内涵表现出来是个难点。“don't flip flop”“don't get sidetracked”“don't go astray”“no dithering”“don't sway back and forth”“no major changes”的译法毫无新意，也有出现“bu zheteng”和“zig-turn”的译法，“bu zheteng”体现了中式英语的流行，“zig-turn”的译法别致形象，但很多中外词语在各自特定文化中仍缺乏等量价值的表达方式，具有现实针对性和中国特色的“不折腾”在英文中无法对译，目前仍无官方标准译法。这就需要在翻译过程中运用存疑法，保留疑问，随时代进步不断加以思考和创新，不断考证，丰富内涵，寻求最佳译法。



很多翻译文本的呈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都必然要经过一番考验和淬炼。“脱贫”“不折腾”等词语译法虽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但未必精确,译者精心打磨后的译法也许仍存在漏洞,人们对每一个翻译结果不断地存疑,就会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对译法进行考证,无论对错,这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四、考证法应用于翻译实践的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中外语言都在逐渐融入彼此的生活。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的新阐发使翻译发生“文化转向”,此举对翻译实践研究受益匪浅(Aksoy, 2020: 29-45)。翻译实践应讲究“炼字”精神,方可知己知彼。思维与语言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影响着思维,也是人们意识形态的反映。译者针对“本国的”文化情景做出的阐释性翻译总是超出“外国的”文本(Venuti, 1995: 37)。透过对《东瞧西望》翻译实践的分析,不难发掘出考证法在翻译实践中的巧妙运用。在考证扎实的基础之上,精益求精,反复磨砺,翻译才能准确且得体。中国的翻译实践研究在广泛博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同时,必须求真致信,方可魅力永存。

考证法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历史学”,也能使翻译实践研究成为“科学的翻译学”。译者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应做到考一词,立一句,究一语,都有证据。考证法研究告诉我们,译者的翻译功夫不仅要过硬,还需有译德,即成熟的心智和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质,内心怀有国家情怀和民族使命感,透过表面了解背后内涵。毕竟,字里行间显匠心。翻译学研究应学习史学的知人论世,通与专相结合,情志交融,对翻译研究饱含温纯与敬意,才能沉浸其中,心无旁骛,翻译实践才能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翻译实践中的考证性研究也应该具有法学精神的一丝不苟,我们应该把每次考证词语译法的过程都当作非同小可的翻译“断案”。同时,译者要见多识广,知识储备越充足,就越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合理准确的考证。在文学、科技、经济、法律翻译等实践过程中都需考证之术。同时,语言准确的译法又对今后的翻译实践考证性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二者相得益彰,与时俱进,共同汲取过往经验,教化当前,引导将来。

五、结语

在翻译实践研究中,考证法是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作为译者,考证法是提高学术素养和翻译水平所需掌握的方法之一,其意义正如钱钟书在《管锥编》的短序中所言“警观疏记,识小积多”。在《东瞧西望》专栏中,陆建非见微知著,以小窥大,对传播中国价值观的标志性词汇进行深究,促进东学西渐,不啻微芒,造炬成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声音。翻译实践研究离不



开对词语译法的考证。词语的译法是错综复杂的，考证方法亦因之多种多样。为避免翻译失当失妥失误，考证是译者必须具备的技能和必须研究的方法。

参考文献

- [1]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2]冯利. 古汉语词义的历史考证法[J]. 辞书研究, 1986(05): 26-33.
- [3]方梦之, 庄智象. 翻译史研究: 不囿于文学翻译——《中国翻译家研究》前言[J]. 上海翻译, 2016(3): 1-8+93.
- [4]浮田和民, 李浩生译. 史学通论[M]. 杭州: 杭州合众书局, 1903.
- [5]黄龙. 莎名考证及其翻译[J]. 中国翻译, 1999(05): 3-5.
- [6]金宏宇. 考证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2): 156-175+202-203.
- [7]陆建非. 英语中如何“打虎”“拍蝇”“猎狐”[N]. 社会科学报, 2018-09-05(005).
- [8]陆建非. “打铁还需自身硬”怎么译[N]. 社会科学报, 2018-11-29(005).
- [9]陆建非. 面向未来的“命运共同体”[J]. 英语世界, 2019, 38(12): 92-93.
- [10]陆建非. “一带一路”英译名的精妙之处[J]. 英语世界, 2019, 38(05): 84-85+87.
- [11]陆建非. 英语媒体如何翻译“脱贫”[N]. 社会科学报, 2019-04-18(005).
- [12]陆建非. 从“拍巴掌”到“跳探戈”[J]. 英语世界, 2020, 39(04): 96-97.
- [13]陆建非. 两场改变命运的考试[J]. 留学生, 2020, (000)001: 48.
- [14]陆建非. “黑科技”并非是黑色的[EB/OL]. (2018-11-02)[2020-07-17]. <https://mp.weixin.qq.com/s/qzdbx7w2G2diT2z7SNa78Q>.
- [15]陆建非. 难倒双语专家的“不折腾”[EB/OL]. (2018-12-18)[2020-07-17]. <https://mp.weixin.qq.com/s/Ge3Mz8B0kgGKkZ6j7qeRww>.
- [16]陆建非. “实锤”在英语中的替身[EB/OL]. (2019-07-04)[2020-07-17]. <https://mp.weixin.qq.com/s/Mrv5sAoMoiavyFUOPEaHbw>.
- [17]陆建非. “直播带货”在英语世界的表达[EB/OL]. (2020-06-19)[2020-07-17]. https://mp.weixin.qq.com/s/6dxZwR7jyHRJq4CFlna_ow.
- [18]陆建非. “后浪”在英语中如何推“前浪”[EB/OL]. (2020-07-13)[2020-07-17]. <https://mp.weixin.qq.com/s/tUPoExI1HFe3WHeBg0mU5Q>.
- [19]刘颖. 简评19世纪西方客观主义史学思想[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1998(02): 6-8.
- [20]潘志明. 《诗经》翻译中的考证行为和阅读行为[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8(03): 3-5.
- [21]祁龙威. 考证学与历史研究[J]. 扬州大学学报, 2002(03): 70-78.
- [22]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8.
- [23]乔治忠. 中国史学起源问题新论[J]. 史学史研究, 2011(03): 26-33.



- [24]史汉生. 论文学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考证[J]. 今日科苑, 2007(16): 237-238.
- [25]王娟. “如实直书”与兰克史学思想[J]. 史林, 2018(01): 185-197+222.
- [26]王国维.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A]. 王国维论学集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07.
- [27]奚兆炎. 翻译勿忘考证——评《我的中国世界》中译本[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9(04): 69-72.
- [28]姚以恩. 知识考证与翻译[J]. 中国翻译, 1985(09): 17-19.
- [29]Aksoy, Nüzhet Berrin. Insights into a New Paradigm in Translation[J]. *Babel*. 2020, 66(1):29-45.
- [30]Comte, Auguste.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Auguste Comt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1]Holmes, J.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Toury, G. *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 New Delhi: Bahri Publications, 1987 [1972]: 10-25.
- [32]Kwok, Sinea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Language Myth: an Integrationist Perspective [J]. *Language Sciences*, 2020, 80: 1-16.
- [33]Spencer, Herbert. *The Study of Sociology* [M].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99.
- [34]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作者简介] 李瑞雪,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MTI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翻译研究。

卢敏, 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

[电子邮箱] 李瑞雪: 1538331626@qq.com; 卢敏: lumin@shnu.edu.cn